



文学

审美欣赏

方法指要

吴甸起 著

⑤

美的本质、美与艺术、人与历史的关系

精品



时代文艺出版社

文学审美欣赏方法指要

吴甸起 著

⑤

时代文艺出版社



怀念故土 魂系中华

——美籍华人作家方方小说解读

美籍华人作家方方，在1975年编选出版了自己创作的短篇小说集《挖番薯的日子》。

作家最先将自己的观察视角定位于“表现自我”及其人生青春生涯，以浸润诗情和勾摄魂魄的笔致，呈示了台湾知识分子的心态轨迹和感情潮汐，浓缩了纷纭复杂的社会矛盾。

《酒后》当属早期作品，寄托了“我”对失去的“青春和爱情”的深挚痛悼和凄切怀缅，并于娓娓含情的对话中蕴含了人生迷惘和不懈追求的复杂心态。小说结尾处凭借“我”的梦境，把交织着人生孤独迷惘和渴盼探求的深层感情寓言化了，诗情内化了。

在《两地》中写的是“我”的生活际遇的实感，



在风浪拍卷的海岛小堡与大洋彼岸异域名城，双向穿插记叙了驻军与求学的真切感受，旧金山三等戏院的喧嚣戏闹，海岛“康乐队”庸俗不堪的拿姿作态，尽管流离异域和蜗居孤岛的生活情境有所不同，但那种如同生活在沙漠中的深重的寂寞和无限的惆怅则是相同的。作家对“我”倏而异域、倏而小岛的情思心迹，并没有铺展什么故事情节，仍是采取素描式的拍摄，并将两地的时空打乱重新组合，但写得依旧真切明晰，了然可读。

《你，她和镜子》同样也是表现知识分子情感变异的，但它采取了颠倒时空和意识流动的结构手法。其情节并不复杂，集中写了两个明丽辉煌的圣诞节，前后12年的生活变迁和岁月流失，鹤去楼空，物是人非，曾经热恋过的一对情人各自组合家庭之后又相遇了，无言的注目和有言的应酬，都无法抑遏心灵深处的悲哀痛苦。作家描写的这场发生在美国匹兹堡的“沈园旧事”，异国风情，异国境遇，但着力烘染的却是“沈园旧事”的精魂神魄——对早年美好爱情幻灭的悲悼和回盼。这种悲悼和回盼，一方面，采取情事之诗（圣诞舞会）的动人景境的描绘，爱情误解的心潮和误解心潮的爱情，使“你与她”的灵犀相通相撞而迸发出瑰美的光彩；另一方面，采取情义之论（桥



屋相会)的对话的记叙方式,“你”问得直率,“她”答得迷离,“问”本应无须再问,“答”本应无须再答。作家对男女主人公早年爱情伤逝的悲悼是写得相当凄切、迷离和深刻的。作家痛悼的岂止是消逝的爱情,难道其中不包蕴着青春岁月、姣好年华和如花如梦的情思吗?作家在题目中将“她、你”和“镜子”并列,小说情节故事中几次写到镜子、镜光以及镜中的人貌和影子,是说镜中见真的生活辩证法的严峻,还是说镜子映花的人生命运的变幻,同样也带有哲理的意蕴和象征的比附,需要结合小说的情境氛围和艺术想象去细细地感悟。

与前三篇相比,十多年后写出的《林医生的朋友》,虽然同样表现的是青年知识分子,但已经不是倾注于胸臆的诗情濡染,也不再是青春浪漫曲的梦幻重现,而是直面现实富有个性地勾画了两个不同类型的青年知识分子。林医生是一个正直的青年知识分子,他老老实实做学问,清清白白做医生。他也曾对黑暗的现实抱有愤愤不平的感慨,甚至在讲到亲阿舅在二二八被屠杀时还会发出一番沉痛的控诉,但他最终还是被“清白——勤恳”的生活信念所规范而不能迈进一步。林医生的朋友马名扬,是学生地下运动的领袖,是一个与现实格格不相容的“自由主义”者。



尽管马名扬这个形象塑造得还不饱满，但能够把艺术视角取向于进步青年，并且投之以英雄的笔墨描写进步青年悲壮死去一幕，充分表现了作家对台湾现实命运的积极关注和对自由进步社会前景的向往。

二

方方在1973年发表了《陆军上土陶多泉》。陆军上土陶多泉以及他周围的许多官兵，是在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的大撤退中，被裹胁着南逃至广州而后又来到台湾的。20多年来，他们在台湾当老兵，有亲难见，有家难归，隔岸相望，痛断心肠。应该说，这个题材本身就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鲜明的思想倾向性。作家对几个军士的形象刻画得很逼真：陆军上土陶多泉对万县老家过年“掷状元红”游戏的真切回忆，机械中士熊华光与军中乐园老妓女看似怪异实则真挚的爱情，士官长陈绍发一讲话便“这个的，时间”一类口头语不断，愚拙之相十足，而实际上深谋远虑、暗中安排、神不知鬼不觉地乘着轮胎来到“那边”（即大陆）。作家通过对不同侧面、不同人物、不同个性的艺术描写，较为完整地刻画了军营的生活面貌，呈示了军士生活命运的凄苦和精神生活的悲悒，



其中关于 9804 兵工连除夕之夜的描写最为凄楚动人。军士们谈少小离家，谈家乡的风俗人情，虽然言语中难免不带上一些“政治教导”多年的影响，但心灵深处埋藏着的仍然是对家乡故土的深深眷恋和挚爱。

《迷失在雾中的飞机》，小说的主线是着意刻画中尉飞行官陈家隆的生活命运和人生道路。他出身卑微，自幼寄人篱下。但他不甘心于命运的安排，违逆母亲的心愿而做了飞行员。他的飞行技术很好，陆教导官认为他有资格参加“雷虎特技小组。”但陈家隆的精神生活并不充实，他去新生社前在大街闹市的游荡闲逛便说明了这一点。由小说标题《迷失在雾中的飞机》所示，并在小说后半部对题示做了情节上的具化和蕴意上的铺垫，使得人物的现实命运和人生归宿变得十分迷离难测了。“迷失在雾中”的究竟是飞机，还是驾驶飞机的陈家隆，是真的迷失在雾中而坠毁，还是“迷失雾中”失去联络而后“失踪”了——飞向了大陆？小说的结尾以及标题所示是颇耐人深思和寻味的。

《闹营》的标题所示是小说的中心事件，围绕这个中心事件联织了台湾军界几幅不同色彩的图画，相当广阔地反映了台湾军队官兵生活情景。特别是直接表现了官兵之间的矛盾纠葛和残酷斗争，十分逼真地描写了“官逼兵反”的过程，副连长陈刚武对新兵庄



金灶的欺压折磨是令人震惊的，小说中关于陈刚武“用大皮靴踩住庄金灶脖子，逼着金灶吞进地下的一团污泥”的情景描写，以生动典型的生活场景和细节，揭示了台湾军旅官兵关系的阶级实质。“官逼兵反”的表现形式就是“闹营”，金灶乘夜端枪打死穷凶极恶的副连长，“一串枪响，像野地里打的霹雷”，作家这样结局包蕴着深刻的含义。

三

方方长期生活在美国，对美籍华人生活的描写是他小说创作的重要方面。较早发表的《锺阿公和我们》，最初是以报告文学形式发表的，记叙了作家所经历的一段真实的故事。书中写的阿公是1910年来到旧金山的华工。到老了，工不能做，家不能归，住在又臭又脏又乱的阁楼里过着牲畜一般“甚至于不可能是任何动物”过的生活。锺阿公的辛酸悲苦身世就是千千万万华工命运的真实反映，美国现代文明的豪华建设沾满了华工的血泪。

《职业妇女丁美娟》是发表在香港《七十年代》上的一篇小说，是标志着作家走向艺术成熟的力作。它以一个知识妇女的生活道路和心灵历程，展示了



“自我个性”与“现实社会”的矛盾，呈现了东方传统道德与西方精神文明的碰撞，相当有深度地剖视了美籍华人的内心世界。

中国妇女，不仅走向了社会，而且走向现代文明的美国，她们会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她们将怎样扮演“职业妇女”和“家庭主妇”的双重角色？在她们的心灵深处经历了怎样的寻觅、探求、矛盾和抉择？本小说对高级知识妇女丁美娟“出家——回家”圆圈式的生活轨迹的勾画，做出了颇为启人深思的回答。丁美娟学识渊博，富有开拓精神。她不甘心充当贤妻良母的“家庭主妇”的角色，毅然离家到外市一家公司做了维金森老板的高级职员。由于她的精明能干，博得了老板的赏识重用，称她为“我的右手，我的灵魂”。丁美娟不仅事业上找到自我的现实位置，在西方商界上层人物交往中实现了自我的价值，而且还在与男朋友池欣一起欣赏音乐的共同艺术爱好中构建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精神生活的“象牙之塔”。小说中关于他们欣赏、品评和创作音乐作品的描写文字，呈示了人物心灵对审美境界的寻觅、发现、感悟和升华，表现了华人高级知识分子对西方古典音乐的深邃理解和感情共鸣，并且由此内化为小说潜在的文化品位和审美特色。然而，西方文化熏陶和人生价值毕竟不是唯一的精神影响力量，中华民族传统的伦



理美德和道德陈习从正负两个侧面与西方文化道德意识行为发生了对峙撞击，使丁美娟的现实探求和业务拓展陷入了迷惑、困顿和尴尬：丈夫对“东方家庭”生活和“主妇传统”的要求，异性朋友间的友谊在夫妇感情关系上投下的浓重的阴影，男上司对女职员的赏识、器重以及随之而来的性骚扰，都使得她不得不舍弃公司的重要职位，不得不结束那种“音乐欣赏——真挚友情”的精神梦幻，最后回归到原来出发点——丈夫的身边并担当起生儿育女的“天职”。小说结尾处写到尿布、奶瓶和婴儿的哭声，“在审美的幻想中编织的一片音乐的山坡”，并没有透散出小家庭生活的柔情、温馨和幸福，而是充满了知识妇女从“公司干才”回归“家庭主妇”的人生悲剧色彩。丁美娟的奋斗与妥协的现实道路，以开阔的生活场景和辐射的社会视角深刻地表现了“自我个性”与“现实社会”的矛盾和离异的过程，反映了当代美国华人世界社会问题的新层面。

在《职业妇女丁美娟》之前发表的《灰鸟》，也是一篇独具艺术特点的小说佳作。小说主角之一的“爷爷”即庆老，当年是一位“铁骑夜出雁山道，一剑横扫五干军”的将军，他戎马生涯大半生，最后把三个子女都送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就读定居，并且在“熬到夹包年华”时也来到美国与儿女子孙们团聚。可是，他却感受不到



团聚的幸福和天伦的快乐，而深深陷入了凄苦和孤独之中。子女们“学业上都有点成就，生活中可一点中国味也找不到了”；儿女们自有他们的生活日程：“白天里大人孩子一阵风似地出去”，晚上回来吃饭、看电视，彼此之间不说什么，即使张口说话也是唧哩哇啦的英文。因为失去了语言的交流和感情的沟通，使庄老仿佛被人投入了荒漠凄寂的孤岛。语言的隔膜，感情的隔膜，关系的隔膜，造成了庆老心灵上难以排解的痛苦。小说中关于庆老与自己孙子毛头对话的描写，一个用英文，一个用汉语，祖孙二人各说各的，所指之事之意风马牛不相及，表面看似乎很可笑——但这是带泪的笑，从祖孙之间彼此失应的对话中流露出一种深沉的悲哀来！作家适应庆老无人可谈、无言孤坐的情境，运用电影叠印和蒙太奇手法，捕捉了他那如泉水奔涌一般的意识流动：一会是戎马倥偬的河洛军旅生涯，一会是兵败如山倒后的香港拮据生活，一会是灯下阅读《太祖本纪》的古雅心态，一会是透过玻璃观赏灰鸟和外国老太太的离情别绪。他的思念飘忽，意识开阔，于寂寞凄清中遥念中华大地，绵绵情思连接着祖国的辉煌历史和千古风流人物的英雄作为，从心灵深处迸发出火热的、高昂的爱国激情，焕发出一种撼心动魄的精神力量。

《灰鸟》的艺术成功，还在于以鲜明的对比层次，



提出了一个海外华人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加入外籍，历经多代，其“根”仍在长城黄河一脉乡土。小说中的庆老，怀念故土，魂系中华，身在异域而心在中国；庆老的三个子女，学成业就，不思旧园，虽然还会说中国话但经常使用的却是英语，而且其思、其情、其知、其行都渐渐“西化”了；至于庆老的孙子毛头，除了血统和遗传因素而外，他自小在海外异邦长大，不知中国的历史，不懂中国的文化，不会说中国话，他差不多是一个美国的孩子了。似此下去，经岁积年，海外华人岂不断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之“根”？这是小说形象塑造和情节逻辑发展呈现出的潜在蕴意，令人读后不能不深长思之。

当然，《灰鸟》的艺术成功还在于刻画了一个海外华人的儿童形象——毛头。作家很善于刻画儿童的心理性格，他的笔触及童事与童心，便神灵活现地凭添了一种生活的乐趣和天真的诗情。小说自始至终极富层次地描写了毛头对灰鸟的发现、观察、喜爱和怜悯，以细腻有致的笔墨表现了毛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纯稚美好的心灵。

《灰鸟》是一篇颇具寓言意味的小说。当然，它的取材和叙述都是直面人生和贴近社会的，小块的时空颠倒和层次分明的意识流动都纳入了全篇的现实主



义大框架。但作家以“灰鸟”为题，并且在小说中以相当的文字描写“灰鸟”，并且从庆老和毛头一老一少的眼里写灰鸟，写它的衰老、凄冷、饥饿和孤独，灰鸟的形象成为庆老心态和命运的艺术象征，象征的笔墨和丰邃的意蕴深化了小说的现实主题。

写到这里，我想说说方方的早期短篇《挖番薯的日子》。这篇小说不仅寄托了作家现实主义创作审美情思，而且同样十分动人地刻画了童心的快乐天地。这篇小说虽然有针砭农村时弊之意，但它的主旨和重点还是写童事、童心、童性和童趣。“挖番薯”这是农村的一件常事，但作家铺展童事，笔下展开了一幅“小河——田地——孩子”的明丽隽永诗画。携友过河的情意，寻叶辨识的学问，挖出番薯的欢呼，独异发现的快乐，都写得笔酣墨饱、情趣盎然，凸现了乡野之景和童心之情的审美境界，并且赋予了“挖番薯”更为深广的涵盖意义。可以说，从台湾农村儿童“挖番薯”的快乐发现，到异国异地城市孩子对“灰鸟生活”的好奇关注，从不同层面体现了作家对孩子审美心理、性格和感情的熟谙、理解和艺术刻画的功力，而对孩子心理世界的诗情洞悉则构成了方方小说最触动人心的优美篇章。



回盼纯挚 诗情斐然

——评韩汝诚中长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是宋代大诗人苏轼描写庐山奇绝秀丽、千姿百态景色的名句。阅读作家韩汝诚的小说便给人一种如同观赏庐山风景的艺术感觉。恰似那仙人洞石松横空，大天池霞落云飞，白鹿洞四山回合，玉渊潭惊波奔流一样，在作家笔端展开的悲惋缱绻的《两家女》报告小说，醇厚朴挚的《腊月》乡土文学，隽永沉郁的《乌兰察布眷情》写实精品，谐谑辛辣的《双眼花翎》讽喻篇什，跌宕变幻的《二等巡官与马车夫》历史小说，别开生面的《关东侠影》传奇故事，纵横捭阖的《碉堡里的女人》长篇巨制，确是色彩斑斓、气象万千，令人目不暇接，心潮为之起伏。但是，万变又不离其宗，如果说“险绝奇秀”构成了庐山万千胜景的共同特点；那么，回盼人生世事的真切写实，探寻生活之美的斐然诗情，便浑然一体地濡染出了韩汝诚小说创



作的总体色调。

韩汝诚在中篇集《乌兰察布眷情》卷尾，着重谈了包蕴创作甘苦和得失真谛的笨功夫哲学，简洁明晰地概括了作家面向人生的写实精神。

确实，在韩汝诚小说创作的素材采撷和艺术构思过程中，鲜明地烙印着作家“自我”生活经历和生活感受的痕迹。别有童心意趣的《腊月》，不啻是作家对自己早年做油房小学徒生活的生动回忆；交织着大草原生活颤音和历史悲歌的《乌兰察布眷情》，是对作家一位表弟三十年来罹遭苦难而坚持与草原人民相濡以沫的真实故事的艺术概括；描写真名真姓“当代人”的《两家女》和回顾有根有据“昔日事”的《二等巡官与马车夫》，其主要人物的原型和故事的主体也都是作家在自己生活经历中所接触到并且深深熟稔的。《双眼花翎》看似荒诞臆想之作——诚然，在偌大春城的“君子兰王国”里，委实没有这种令人想起大清重臣顶戴的贵不可言的名花；据作家言，不过是因为看到自家窗台上一盆非名非贵君子兰大叶上起了两圈病斑，倏忽间如同电石火花般地触动了意象骤



涌的灵思而产生了“双眼花翎”的奇绝构思。它似乎不是根据某人某事立意谋篇的，而且近乎荒唐的故事情节或许难以令非君子兰之乡的人所理解；然而，看了这篇作品的长春人都会毫不怀疑它的真切性和可信性，可以说它是以怪异形式对生活中为数更多的真人真事的观照，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有力地楔入了现实的纵深。尤其令人不无惊诧的是，作为严肃文学的作家，他还写了一部恣肆洸洋、变幻莫测的剑侠小说《关东侠影》（又名《吕四娘别传》），这部堪称雅俗共赏的传奇佳作依然保持了写实的本色。作家为了真实地反映大清帝国雍正年间“维民所止”大冤案的历史面貌，不仅博览精读了许多稗官野史，而且还细致地研究了辽河水系和关东地域的风土人情，甚至对清代市井民俗的某些生活细节还做了认真的考证。当然，更值得称许的，还是熔铸于这部传奇小说中含蓄深邃的主旨底蕴。用作家自己的话说，这是他“严肃地给成年人写的一个童话”，这真是对创作主体意识的绝妙自我概括。以古代血泪斑驳的“文字狱”影射“十年动乱”期间触目惊心的冤假错案，于拳脚厮杀和刀光剑影中蕴蓄着对“四人帮”和极“左”思潮的强烈愤懑之情。这种用现代意识烛照历史生活，以荒诞形式表现逼真现实，只可深切意会而不可再行重复



的社会悲剧，难道对于那些从苦难中走过来的成年人来说不恰恰是“一个童话”吗？当然，“童话”只能采取非现实的形式；蕴藉的“童话”还不足以表现作家对人生与世事的深刻反思，他又根据得来的“反胡风”扩大化的真实故事，创作了凄怆沉痛的长篇悲剧小说《碉堡里的女人》。

如果说韩汝诚的小说作品，是一个个明光闪闪、流动活脱的湖泊；那么，写实精神与独异开掘就像贯通星罗棋布湖泊的一脉长江大河，它气势遒劲，涌荡不息，源远流长。作家执着于人生写实，是与他经历的生活坎坷和“蹉跎岁月”分不开的。在被迫离开文坛而做了油工、锅炉工的“二十二年”中，他像《灵与肉》和《大墙下的红玉兰》作者一样，被一种扭曲怪异的历史逆向力量无情地抛掷到社会最低层，这就使他真正地看到了交织着“爱与恨”的纷纭驳杂的生活原色，明晰地认识了人民心愿的选择和潜在伟力的流向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亲身体尝到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普通人优美心灵和纯洁品格所蕴藏的道德力量。可以说，他对人生要义和生活真谛感受得太多太深了，所以，当他重新拿起缪司的竖琴的时候，他不能抹去昔日苦难曲折生活在心灵上镂刻的轨迹，不能忘记在艰难时世曾经给予他温暖和帮助的人